



服务经济新时代真的来临了吗？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有为

本报记者 裴珍珍

当前，随着经济服务化全面提速，城镇化、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服务业正在逐步成为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主力军。在这一背景下，准确分析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并对服务业发展最紧迫的任务进行理论分析，对于更好地促进服务业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有为。

Q1 中央提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从服务业等方面付出努力，怎么理解？

来有为：当前，在全球化的服务经济革命中，谁引领了服务经济发展的潮流，谁主导了服务产业的创新，谁掌握了服务市场的导向，谁就更能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与主导权。发展服务业，不仅能够增加就业，而且有利于推进城镇化、扩大内需。近年来，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对国内旅游、现代物流、创意产业等服务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正逐步显现，推进产业融合和农业服务化、制造业服务化的效果也在逐步释放，由此形成的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正逐步增强。以文化产业为例，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5500美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个阶段居民文化领域需求呈“井喷”之势，我国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的潜力非常大。随着我国工业化由中期向后期逐步过渡，文化创意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比重将显著提升，成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点。

Q2 近年来，经济学界一直有关于“服务经济时代来临”的大讨论，“服务经济新时代”真的来临了吗？

来有为：一般而言，服务经济是以服务活动为主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服务经济形成的主要标志是：经济中从事服务活动的人员及其创造的增加值超过农业和工业之和，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50%以上的比重。由于我国长期存在“重制造、轻服务”的观念，重点发展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服务业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呈现缓慢但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服务业占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仍然偏低，国际竞争力不强。从服务业的内部结构看，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低，发展滞后。以2011年为例，我国服务业同比增长8.9%，服务业增加值占我国GDP的比重为43.1%。对比国际水平，可以说我国距离服务经济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Q3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制造”在产业链中的位置有关系吗？

来有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制造业分工协作越深化，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越大。当前，在我国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很多企业是两头在外、以贴牌生产为主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因此，企业在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培训与管理、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支出很少，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不旺盛。

Q4 发达国家在发展服务业方面走在前列，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来有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已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趋势。近年来，国外许多原有的制造型企业通过大规模的进入或兼并工业生产性服务业来整合原有的业务，如GE通过进入金融业为其客户提供贷款，来刺激其产品的销售；HP公司通过兼并服务型企业，从而为客户提供从硬件到软件，从销售到咨询的全套服务；IBM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由制造型企业成功转型为服务型企业等，均有力地说明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Q5 下一阶段，我国服务业应如何把握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

来有为：针对我国经济实际情况，我认为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实现经济跨越式转型，是当前我国的战略选择。对服务业来说，要紧紧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宝贵机遇，大力承接高端制造业转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大力加强技术引进和跨国合作，利用全球科技和智力成果，全面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要通过并购、战略合作、管理咨询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与理念。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成全球优势生产要素，推动整体产业链的优化重组，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本版编辑 赵登华
制图 马志刚
邮箱 jirbsj@sina.com

对产能过剩要有充分估计

本报记者 马志刚 欧阳阳



产能过剩一直是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这些年有加剧势头。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也表明，2012年我国工业领域、工业制成品总体上生产能力过剩，产能利用率比较低。对此，各方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此次产能过剩将对中国经济形成重大挑战；也有的人认为，产能过剩没什么大不了。

那么，本轮产能过剩对经济究竟将产生怎样影响？有什么特点？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化解？

嘉宾

此次产能过剩程度大、影响深，波及范围不局限于传统产业



王一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吕政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副主任



冯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市场需求消化不了已形成的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和过剩加剧的重要原因

吕政（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产能过剩有利于竞争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问题在于我国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加剧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此外，市场竞争的淘汰机制又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低效率的生产能力退不出去，降低了生产要素的宏观配置效率。

市场需求消化不了已形成的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和过剩加剧的重要原因。从国际上看，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从国内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重化工业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阶段。目前重化工业在工业增加值的构成中已超过70%。拉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动力，一是10多年来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城镇化进程加快；三是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住宅分配体制的变化，促进了城镇商品住宅建设的快速发展；四是2005年以后，轿车进入城市家庭出现了井喷式的高速增长。这四大因素导致对重化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推动了重化工业投资扩张。

但现在我国工业高速增长扩张的客观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从外部需求看，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是突飞猛进，而是进入调整阶段。一是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危

机，国际资本流动放缓甚至回流；二是国际产业转移放缓，以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三是由于发达国家需求增长回落，国际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四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工业品出口增速回落不可避免。从国内需求考察，推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四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高速公路、机场建设等由高速增长为主导转向填平补齐为主导；受到土地资源供给、城市就业机会等条件的制约，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将转向平稳适度增长；城镇商品房价居高不下抑制了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汽车普及的进程也逐步趋缓。这些变化，导致市场需求消化不了已形成的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和过剩加剧。

如何应对产能过剩？一是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二是保持适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加强重点领域的建设；三是降低房价，激活城镇对商品房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四是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环境保护标准、控制银行信贷等手段，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

避免产能过剩加剧，关键在于让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这一轮产能过剩还是非常严重的。粗钢产能看样子是要超过10亿吨了，但需求却远低于这一数字。不仅钢铁，其他领域也广泛存在产能过剩，值得警惕。

但我们不能将目前的产能过剩归结于当初的4万亿投资政策。为什么这么说？

商贸服务业怎样“走出去”

祝合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巨大成就的背后，从开放经济的角度来讲，主要存在着内需与外需、进口与出口、内贸与外贸的失衡。而要解决这三大失衡和实现中国经济由大变强，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加快实施中国商贸服务业“走出去”战略。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商贸服务业“走出去”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从空间分布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境外批发和零售业投资的国家（地区）主要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根据《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称，截至2011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90.9亿美元，其中在香港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08.5亿美元，占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3.2%，在东盟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6.99亿美元，约占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5%。而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2.85亿美元，占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6%，在欧盟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8.09亿美元，占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6%。从经营主体看，主要是经营规模不大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较少，

而且大多为制造型商贸企业，并非独立型商贸企业。从经营方式看，主要是经营批发市场，经营业态较为单一，且没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些状况的直接结果是造成我国商贸服务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水平偏低、国际竞争力不足。据德勤事务所《2012全球零售力》报告称，2010年，全球零售企业250强海外销售额达到销售总额的23.4%，平均跨国经营国家数达8.2个，而我国商贸企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

导致这种状况既有我国商贸服务企业自身存在的因素，如经营规模小、经营管理落后、知名品牌缺乏等内部原因，也有我国政府对商贸服务企业“走出去”支持不足等外部原因。因此，要加快实施我国商贸服务业“走出去”战略，必须内外兼收，齐头并进。从商贸服务企业自身来说，“走出去”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以及自身的条件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商贸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先易后难、先难后易及混合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商贸服务企业通常采用先易后难的发展模式，以减少“走出去”的风险。例如，走国际化经营的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最初选择进入地理邻近且

文化差异较小的墨西哥、加拿大，然后进入地理位置较远的阿根廷和巴西，再进入地理位置远且文化差异大的亚洲市场，最后才选择进入地理位置远、市场竞争激烈、政府限制较多的欧洲市场。而且，沃尔玛还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以及自身的条件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目前我国商贸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也主要从香港和东盟地区扩张开始，符合国际基本经验，值得借鉴。

从外部因素来讲，需要政府完善支撑体系，为商贸服务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和支持。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我国政府对商贸服务企业“走出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如与东道国建立政策协调机制，包括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开展政府间商贸流通政策对话、减少或解除东道国对我国商贸服务企业的“走出去”的各种限制或经营范围的限制；鼓励政府驻外行政机构和金融机构为商贸服务企业走出去提供各种商业信息，提高其投资的经济效率；提供财政、金融、税收支持和投资保险服务；此外，还要逐步建立和健全商贸服务业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为商贸服务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保障。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流通研究中心主任）



据德勤事务所《2012全球零售力》报告称，2010年，全球零售企业250强海外销售额达到销售总额的23.4%，平均跨国经营国家数达8.2个。而我国商贸企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借鉴国际经验、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完善政府支撑体系，探索“走出去”的新路径。

